

書評

考古人類學刊 · 第 91 期 · 頁 123-130 · 2019

DOI: 10.6152/jaa.201912_(91).0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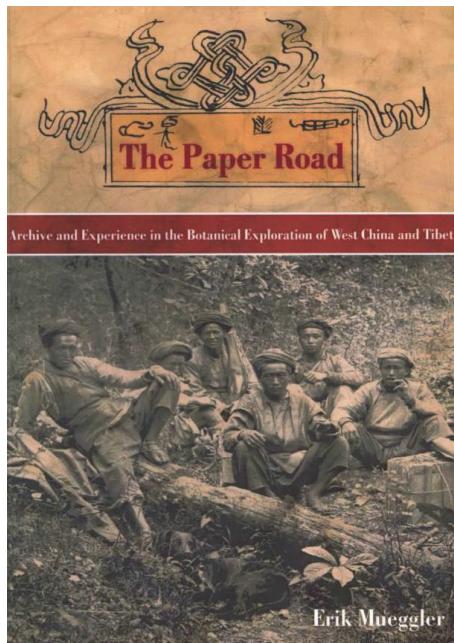
「檔案」和「體驗」：歷史過往中的日常生活與社會關係¹

讀《紙路——中國西部和西藏植物探索的檔案與體驗》

Book Review: Mueggler, Erik. *The Paper Road: Archive and Experience in the Botanical Exploration of West China and Tib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張廣東 Guang-dong Zhang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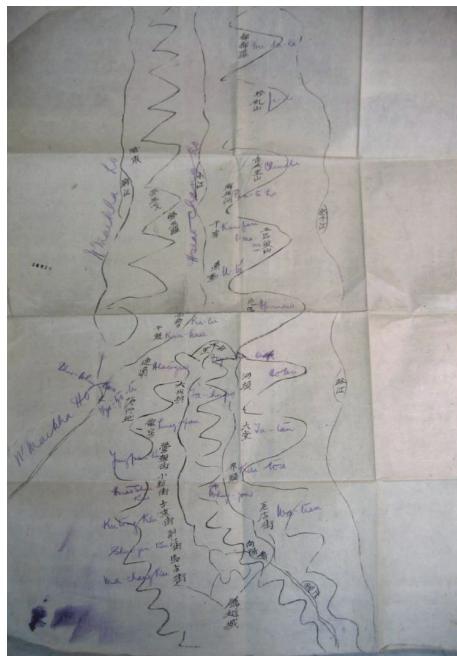


圖一 《紙路》封面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授權使用)

《紙路——中國西部和西藏植物探索的檔案與體驗》(*The Paper Road: Archive and Experience in the Botanical Exploration of West China and Tibet*)一書封面。穆爾克用來做封面的照片拍攝於 1920 年代，當時趙成章與福雷斯特產生意見分歧，趙成章獨自帶領一支納西族探險隊依其民族起源地神話為福雷斯特找尋「杜鵑花起源中心」。這是一趟危險之旅（見第四章），而照片上的他們卻從容淡定、身體放鬆、面露微笑。該次旅程收穫頗豐，採集了約 200 種杜鵑花植株。

民族誌的寫作是人類學的看家本領，但要達成客觀的描述記錄、深入的理論分析、嚴謹的歷史考據及靈動的敘事可讀之間的平衡著實不易，能夠獲得其他學科的關注和好評更是難得。美國密西根大學人類學系教授穆爾克² (Erik Mueggler) 的著作卻是個例外，他 2001 年的第一部著作《野鬼時代——中國西南部的記憶、暴力和地方》(*The Age of Wild Ghosts: Memory, Violence, and Place in Southwest China*) (以下簡稱《野鬼時代》)甫一推出即大獲好評並贏得美國麥克阿瑟基金會 (MacArthur Foundation) 2002 年度的獎勵。《紙路——中國西部和西藏植物探索的檔案與體驗》(*The Paper Road: Archive and Experience in the Botanical Exploration of West China and Tibet*) (以下簡稱《紙路》) 是他時隔十年之後出版的第二部著作，出版後亦不負眾望，繼續博得各界讚譽，獲評美國環境人類學 2013 年度「朱利安·斯圖爾特圖書獎」



圖二 趙成章繪製明光峽谷地圖（愛丁堡皇家植物園提供）



圖三 福雷斯特繪製明光峽谷地圖（愛丁堡皇家植物園提供）

圖二為趙成章沿用 18 世紀麗江地圖（見 p. 6-7）所代表的中國傳統製圖方式，按照他感知的滇西北河谷的位置及其相對於整個區域的方位繪製的明光峽谷地圖，福雷斯特在圖上以藍色英文進行了補注；圖三為福雷斯特以現代製圖學方式繪製的同一地點的地圖，其中標明了方位，一條用黑色實線表示的道路是該地圖的核心。

(Julian Steward Award)。與在長期田野調查基礎上完成的《野鬼時代》不同，《紙路》是借用散落於植物學、歷史學、地理學、文學傳記等不同學科的文獻材料完成的著作。但穆爾克依託人類學對儀式、宇宙觀、親屬關係、宗教文化等面向的研究積澱展開分析與記敘，將殖民遭遇、地域差異和文化衝突的宏大歷史與兩位西方植物學家福雷斯特 (George Forrest) 與洛克 (Joseph Francis Charles Rock)、兩代納西族本地人（以趙成章為首）於 1906 至 1950 年在中國西部合作進行植物探險的經歷結合，聚焦於檔案 (Archive)、表述 (Representations) 與體驗 (Experience)，以其敏銳的感知能力、高超的敘事技巧、抒情的書寫風格和極具想像力的分析框架，將歷史敘事、地景分析、哲學思考和人類學關懷編織成一個引人省思的故事，帶領讀者穿透過往歷史，重新捕捉逝去時空中的日常生活與社會關係，展現了人類學研究對歷史、對文化、對自然、對人的關懷與理解。

一、紙上的中國西部： 檔案（Archive）與表述（Representations）

穆爾克的敘述從兩幅並置的地圖（p. 12-13）開始，一幅是趙成章繪製的滇西北明光峽谷地圖，徒手、自信，依靠記憶繪製，既不標注經緯，也不在意比例，記錄的是他對遠山、近水、村落和地方關係的體驗，表達著他如何感受所棲居的這片複雜而廣闊的地理，福雷斯特在這張地圖上用鋼筆和鉛筆留下了修改和標記，並把其中一些地名轉譯成拼音；另一幅是福雷斯特繪製的地圖，聚焦於河谷，局促、猶豫，他從趙成章繪製的地圖中進行了抽取，借用、修改和翻譯，以揭示出尚未被分類填充的區域。作者細緻地指出了兩幅地圖的區別：趙成章的地圖省略了道路，而福雷斯特的地圖裡，道路反而是核心。這反映出二人之間的關係與差異：對地球進行描繪，並使其成為對地球的感知指南是一個表述的過程，包含了不同的價值觀念和身體體驗，對趙成章來說，滇西的地景是他對地球上各種「文化意象」（cultural images）（p. 14）的體驗，對福雷斯特來說，植物探險是西方殖民帝國科學探索、收集和歸檔世界努力的一部分，作為參與者的他需要從帝國的角度出發，去想像、感受和思考所處的世界，將帝國之外的其他地方視作有待瞭解、開發並征服的客體。從地圖開始，穆爾克將檔案、表述、感知、體驗與殖民遭遇、文化衝突、地方知識、價值觀念連接起來，展開了一段「自然、地方和人如何紐結在一起」（p. 16）的觀察與表述之旅。

對西方植物學家和本地合作者而言，植物探險是一趟在檔案和體驗之間反覆穿越的旅程，在這趟旅程中，中國西南邊陲占據了一個特別的位置。一方面，該地區處於殖民意識形態下的中心與邊緣、自我與他者、文明與野蠻的分野之下，是西方殖民擴張末期的最後一片「空白區域」（p. 14），周邊的國家和地區多已經淪為英、法殖民勢力的殖民地，將該地區編入地圖與檔案是殖民征服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中國內部，該地區與中國其他地區交通連接不便，地理環境上自成一體，自古即形塑出複雜的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地域性政權、土司制度、改土歸流等治理機制曾在該地區更迭沿革，存有各種遺緒，20世紀初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的民主革命也已延伸至該地區，引發著不同地方勢力間的此消彼長：同時，該區域分布著眾多不同的民族群體，除納西族外，還生活有漢族、彝族、藏族、傈僳族、回族等民族，族群間的交往互動頻繁，族群意識、民間信仰以及社會關係之間既有整合又有矛盾。穆爾克透過地方誌、歷史檔案等材料對宏觀歷史背景進行了描繪，但或許是出於統一敘述風格的考量，並沒有專闢一

章來進行，而是結合在當事人的行動與感受中呈現出來，穿插在各個章節之中。

作為兩種不同的表述機制，西方的殖民意識形態與本地的知識體系如何相遇是作者第一部分重點關注的問題。第一章「他者的凝視」講述了福雷斯特的第一次探險，他依循著帝國要求而來，在穿越險境中體驗著殖民意識形態運作和表述規則所造成的分離，在小中甸（今雲南省迪慶州香格里拉小中甸鄉），他路經一個施行「夥頭」制度的藏族村莊並受到良好照顧，開始有所轉變。不久之後，他得以在附近的雪嵩村（今雲南省麗江白沙鄉玉湖村）建立據點，雇傭了第一代納西人，開啟了與本地知識碰撞、互補、疊加的植物探險合作；兩種知識體系的差異首先體現在宇宙觀念的對立上，穆爾克通過對納西東巴文字、喪葬儀式上的頌歌、家屋空間的分析，指明本地知識體系是由納西族東巴儀式和神話記憶所構建的宇宙觀念和歷史意識（第二章）；二者的重合發生在對杜鵑花演化中心的認知和尋找上，福雷斯特秉持科學主義精神與自然演化論的認知，對納西族合作者不能翻譯到林奈分類體系的植物知識不屑一顧（第四章）。然而，他渴望找到的杜鵑花起源中心，卻發現與納西族東巴經文記載一致，對他的本地合作者而言，植物與環境是他們歷史過往、社會生活和族群記憶的一部分，他們尋找的範圍從未超出納西古國的故地，尋找的方向沿着葬禮儀式上唱誦的經文所指引的方向，與納西族起源的神山重合（第三章），顯然，植物探索的過程融合了西方植物學家的科學認知與本地合作者對地球和社會生活的感知與理解，而福雷斯特的書信與東巴經文的並置分析則進一步證明了本土知識已經塑造了探索雲南植物分布的現代科學計畫（第四章）。穆爾克曾在中國西南（雲南楚雄永仁縣直苴地區）有過長期田野，在《野鬼時代》中，他即細緻的分析了羅羅頗的家屋空間和儀式頌歌，這為他在《紙路》中使用和理解不同材料，繼而展開分析提供了互為參照、交相印證的基礎。

二、路上的西方植物學家與本地納西族合作者： 感知（Perception）與體驗（Experience）

在穆爾克看來，對植物探險過程中生成的檔案和表述的理解不應該停留於其在紙上的留存，它們產生的實際場所是路，是身體在路上的感知與體驗，這在另一位植物學家洛克身上體現的特別明顯，《紙路》的第二部分即聚焦於洛克。洛克一生中不斷地寫作，拍攝與流浪，在探險旅途中，他帶著留聲機和照相機，把三腳架和照相機視為一個虛擬的身體，插入在他和拍攝對象之間，用照相機代替眼睛、用留聲機阻斷聲音，這是

他組織個人和他人感知的方式；他拍攝的標本照片除精心進行構圖外，還會將他的刀、他的帽子，他的馬、馬鞍或者帳篷作為他身體的延伸加入進去，他的攝影術不是客觀的記錄，而是他感知技術和協調方式的展現（第五章）；他對旅途中的餐飲住宿保持著高品質的要求，通過建造真實的和想像中的家庭空間來感知、思考及安排與世界的互動，培養友誼或親密關係，初次到訪木里時，他將政教合一、國王與臣民關係和諧的木里視為一個情感地理中心，而當他在宮殿的地下空間發現一個隱祕的牢房時，立刻想要逃離（第六章）；他依靠自己的感覺來估量山峰的高度，對他而言，山峰並不只是在科學的體系中找到它的位置，原住民眼中，藏傳佛教中對貢嘎嶺、阿瑪尼卿山等山峰神聖化的認知對他更有吸引力（第七章）；在持續經年的探險之旅中，洛克與 12 名第二代納西族合作者發展了如「家人」般的關係，他們都是探險家，但對探險有不同的定義：對第二代納西族合作者而言，父系形式延續的家庭既是財富和權力的基礎，也是生活的最終目標，探險與他們的生活中心相連，使他們可以將無法估量的風險視為可計算的事物；對洛克而言，雖然探險可以將生命中的確定性和不確定性、機會和必要性緊密結合在一起，但他無法成家的自我判斷和種族主義殘餘使得流浪與探險，漂泊與無根成為他一生無法排遣的宿命（第八章）。1929 年底，洛克被一次東巴儀式所吸引，這些儀式描繪的神靈世界與其想像的宜居世界產生了共鳴，促使他轉而收集和翻譯東巴經卷與典籍。親屬制度、家庭向來是人類學關注的重點，在對洛克的記敘與分析上，穆爾克也是由此切入的，洛克一方面借助真實與虛擬的身體協調在植物探險旅程中的感知與體驗，另一方面則通過建造真實和想像的家庭空間來處理和理解自我、自我與他人、自我與社會的關係；同時，穆爾克透過對兩代納西人家庭觀念變遷、中西家庭觀念差異進行的比較，推測了不同探險者的探險動機與動力來源——正是家庭關係、親情觀念等情感力量推動著他們的探險之旅。實際上，這是作者在該書第一章即含有的判斷，但一直隱而不發，反而在不同的章節中不斷觸及、展開，讓讀者一步步信服與理解，豐富的聯想和洞察力或許源於天賦，但將推導的過程表述完備，邏輯嚴謹，亦應歸功於作者嚴格的人類學訓練及過往長期田野的積澱。

三、作為媒介的地景（Landscape）與身體（Body）

檔案是社會生活中可見的物質性存在，感知和體驗卻頗神祕，不容易把握。有鑑於此，穆爾克將地景與身體視為媒介，對兩位植物學家事業進行深入考察，呈現他們居住和穿越地景不同方式，以及與兩代納西人之間的相遇和互動，借助聚合社會關係的地

景和作為感知技術載體的身體，把檔案製作過程中的感知與體驗、主觀與客觀、實踐與表述連結起來。

在分析上，地景和身體的媒介角色是透過「地球之書」(p. 35) 的隱喻而實現的。穆爾克把地球比作一部能夠被閱讀、書寫或修改的書籍，將地景理解為用紙張覆蓋地球的社會過程，行走則被喻為運筆，身體被視為閱讀和書寫的主體。透過這個隱喻，穆爾克得以喚醒讀者的切身感觸，建構起一幅具有畫面感的植物探險圖景，引領讀者順著作者的思路去展開想像，進而形象地理解檔案的製作過程，理解自然、地方和人與檔案製作實踐紐結在一起的方式：一方面，檔案的製作過程是以身體為起點，通過身體在地景中的反覆穿越與運動，創造感知與體驗，形成記憶與表述；另一方面，檔案製作過程也是複雜而豐富的社會關係運作過程，無論是兩位植物學家還是兩代納西人，他們都透過身體實踐，在植物探險的過程中植入社會生活的意義，並在這一基礎上重新定位探索活動。對兩代納西族村民來說，地球為極為豐富的動植物生命和複雜多樣的人世生活創造了條件，地景既是堅定的實體存在，也是感知、體驗和記憶世界的媒介，塑造了他們在生活中每一刻的體驗。長期生活在高原勝景中的納西人一直都賦予高山一種社會意義上的能動性，想像它們是神靈，也以同樣的方式對待溪流和植物，把它們想像成等級較低的神靈（第三章）。他們的人格特質、身體參與、歷史意識、族群記憶伴隨著他們的行動，把地景搬到紙上的過程也是將他們的體驗以紙的形式留存的過程。對兩位植物學家而言，福雷斯特嚴謹科學，常親手製作標本，反覆回到同一片區域探查，他要用植物探索事業幫助其實現社會階層的提升，以更好地承擔家庭責任（第一章）。洛克則需要在探險之旅中安頓自己不安分的身體與心靈，找尋自己與他人居住於世界上的方式（第五章）。另外，也正是在這樣以遭遇和自我形塑為目標的計畫中，在不同的具有自主性（autonomy）和能動性（agency）參與者互為主體、相互生成的過程中，地球具有了自身的能動性，猶如生命的機體，在試圖表述和抽象它的嘗試中，有力地塑造著自己被理解的方式，同時也創造、調動和改變著社會關係。

四、從「可見」到「不可見」：現象學的研究視角

穆爾克沿襲了梅洛—龐蒂（Merleau-Ponty）的現象學觀點（第五章），人們感知任何事物不是孤零零地面對一個事物，感知的過程是一個包含有意向性的表象觀察過程，身處當下，指向缺席，將一個感知當下化，卻也將當下過渡到新感知，由此，人對事物

的感知是「可見」部分和「不可見」的綜合。

兩位植物學家和兩代納西人作為研究對象，早已成為了歷史過往，作者無法透過進入田野現場近距離接觸，參與觀察，與他們交談，記錄而完成田野調查。然而，穆爾克仿若福雷斯特和洛克植物探險的身體實踐，聚焦於書信、日記、照片、地圖、東巴文字與典籍、地方誌與歷史檔案等「可見」的材料，進行收集整理，再抽絲剝繭，互為參照，相互疊加，儼然如進行一次「材料的探險之旅」。如此的努力也為讀者揭示出植物探險和檔案製作過程中諸多「不可見」的側面，如對納西人而言，他們並不是萬物有靈論者，他們賦予自然物種和事物以人類屬性，使用構成社會生活的基本類別來組織人、物種和事物之間的關係，「無生命的」自然物體，被認為是活著的或有靈魂的，並且類似於人，從而將文化與自然、人與非人的世界、主體與客體聯繫在一起，形成一個包含有感官體驗的知識體系，其產生和基礎都在於人們日常的身體理解，即人類是世界、環境、地景的一部分，而不是從根本上與世界分離開來。這在納西人的東巴儀式中表現的很充分，世俗的活動可以充滿宇宙意義（第三章）。相比之下，由兩位植物學家所代表的科學思維或「現代主義」思維則是建立在事物與人、文化與自然、心靈與身體之間的範疇區分與對立的基礎上的，然而，正如穆爾克已經展示了的，自跨進雲南邊界的那一刻起，福雷斯特和洛克都要靠步行或騎馬，旅行數周至數月，身體行走的韻律丈量著對地球的捲入，來自他者的知識與思想也讓局面變得複雜，殖民意識形態的確定性開始瓦解，一起瓦解的也包括那些如何聚焦和表述體驗的思想，使得他們開始用自己的身體行動去改變行走在路上的道德和體驗屬性，開始在時間、空間和身體層面感知、體驗和重塑與世界的關係。

五、結語

總體而言，《紙路》最為突出的特色在於聚焦檔案和體驗，以現象學的視角與方法處理各類材料，以生動與細緻的敘事展開分析，通過對兩位植物學家與兩代納西人植物探險合作中流出的標本、筆記、日記、信件、照片、手稿、文章和書籍等物質材料及這段歷史的考察，勾畫了檔案製作過程中所處的社會關係和日常生活，重點考察檔案製作過程和表述機制，既關注植物探險事業中占支配地位的西方科學主義精神與種族主義意識，也關注傳統認知中處於從屬、邊緣地位的地方知識、歷史記憶與價值觀念，挖掘了隱藏在檔案表述之外的「情感價值」，對讀者而言，重新檢視、梳理這一過程有助於

理解並反思人與人、人與自然、人類與非人類之間的關係；對研究而言，《紙路》則提供了一個如何從宏大的歷史事件中截取細小的內部視角來發展闡釋的案例，從兩位植物學家與兩代納西人出發，穆爾克以人類學的視角觸及到歷史、地理、植物等諸多領域，聯結起地方社會、空間地景、物質文化、身體研究、符號意識形態等多項議題。田野民族誌方法一直被認為是人類學的基本功，與此相應的，田野調查的經歷、民族誌書寫與表述則被視為人類學者的專業標誌。很多民族誌文本對一個地區的問題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敘述，在寫作模式上先講歷史地理、生態環境，接下來是政治經濟、婚姻家庭、親屬制度、社會組織、宗教及當今的發展問題等等，一一羅列，不謂不細，但讀起來卻讓人興味索然。與此相反，《紙路》全書雖然也是涵蓋了上述所有內容，但將這些描述和分析恰到好處地揉合到民族誌敘事之中，呈現了客觀的記錄、理論的探討與文字的靈動可讀之間的平衡，展現了作者個人優秀的寫作能力和表述的技巧。不過，穆爾克強烈的現象學研究方式，以及文學色彩濃厚的書寫風格，雜糅了多種材料交織輔助確立論點，也為理解和把握《紙路》的主旨帶來了閱讀上的不確定性，是作者留給讀者的一項挑戰。

附 註

1. 本文的完成需要特別感謝林瑋嬪教授贈書及多次給出修改意見，筆者在修改過程中受益良多；同時，感謝穆爾克（Erik Mueggler）教授熱忱提供其翻拍自愛丁堡皇家植物園檔案館的兩張地圖原圖，並協助聯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取得在書評中使用該書封面的授權。
2. Erik Mueggler 的中文名「穆爾克」為林瑋嬪教授經與其本人討論後所起，首次使用於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18 年出版之多人合著《媒介宗教：音樂、影像、物與新媒體》，詳見該書的作者簡介（p. x i）。